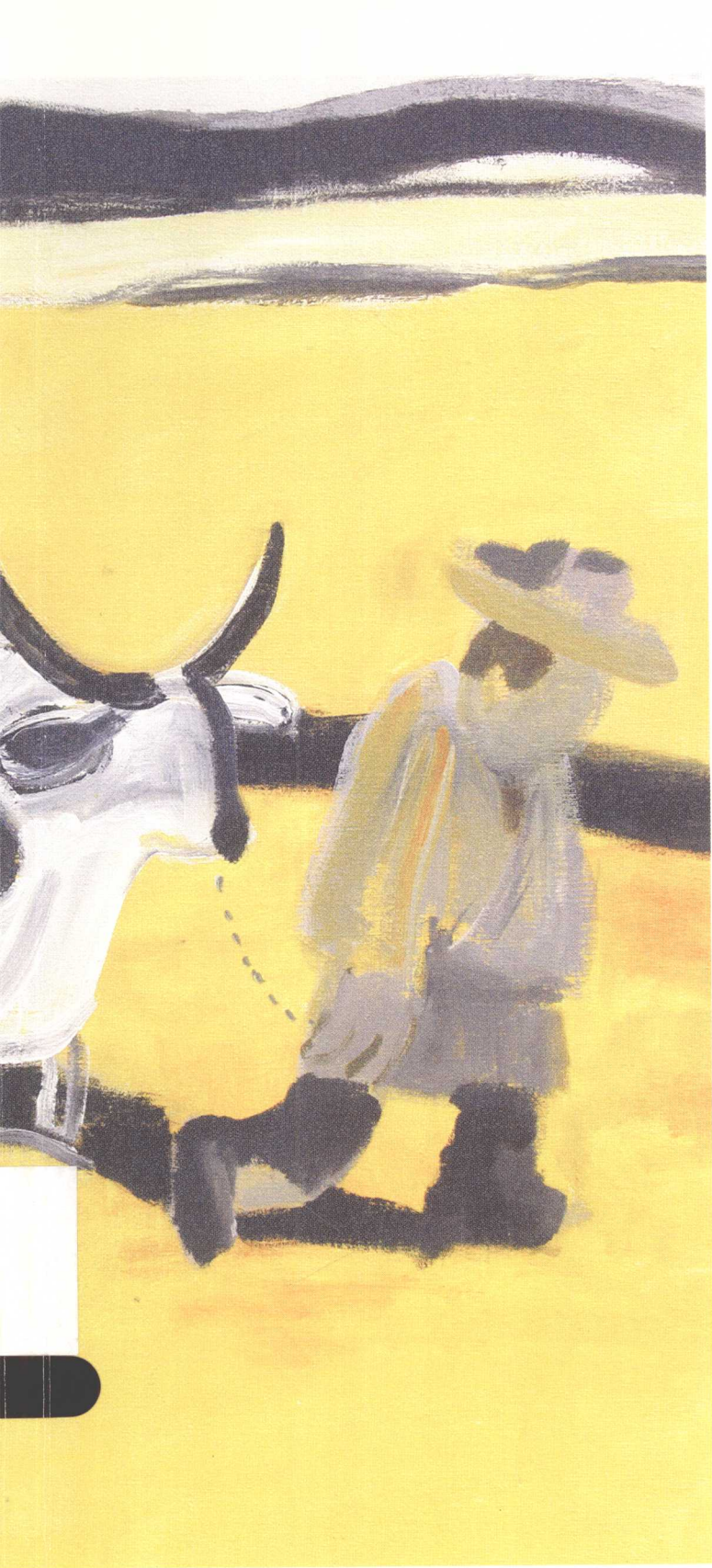




中國小說學會
Chinese Fiction Institution

2013
中国小说学会
中篇小说
排行榜

2013 Zhongguo Xiaoshuoxuehui
Zhongpianxiaoshuo Paihangbang

二十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國百佳出版社

014033414

I247.5
3696

說學會
SAY SOCIETY



2013
中国小说学会
中篇小说
排行榜

2013Zhongguo Xiaoshuoxuehui
Zhongpianxiaoshuo Paihangbang



北航

C1721846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I247.5
369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3 中国小说学会中篇小说排行榜 / 中国小说学会评选.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91-9391-5

I. ① 2… II. ① 中… III. ① 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3856 号

2013 中国小说学会中篇小说排行榜

中国小说学会 / 评选

统 筹 文 欢

责任编辑 张 宇

封面绘画 李东霞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393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9391-5

定 价 39.8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4—6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中国小说学会2013年度 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会

评委会名誉主任:

冯骥才(天津)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小说学会名誉会长

评委会主任:

雷 达(北京)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评委会副主任:

李 星(陕西) 评论家 赵利民(天津) 教 授

特邀评委:

陈骏涛(北京) 评论家 陈公仲(江西) 教 授

汤吉夫(天津) 教 授 夏康达(天津) 教 授

评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春林(山西) 教 授 王达敏(安徽) 教 授

卢 翎(天津) 教 授 江 冰(广东) 教 授

朱小如(上海) 评论家 毕光明(海南) 教 授

汪 政(江苏) 评论家 何向阳(北京) 评论家

李运抟(广西) 教 授 林 霆(天津) 博 士

杨剑龙(上海) 教 授 郭宝亮(河北) 教 授

施战军(北京) 教 授 段守新(天津) 博 士

阎晶明(北京) 评论家 颜 敏(江西) 教 授

藏 策(天津) 评论家

列席评委：

于沐阳（吉林） 教 授

王 侃（浙江） 教 授

刘阶耳（山西） 教 授

续小强（山西） 主 编

王 干（北京） 评论家

文 欢（北京） 编 辑

费振钟（江苏） 评论家

2013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短篇小说

名次	作品	作者	发表刊物或出版社
01	《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	艾 伟	《上海文学》2013年第7期
02	《火锅子》	铁 凝	《北京文学》2013年第7期
03	《醉意》	张惠雯	《人民文学》2013年第3期
04	《大雨如注》	毕飞宇	《人民文学》2013年第1期
05	《老桂家的鱼》	南 翔	《上海文学》2013年第8期
06	《酒疯子》	晓 苏	《收获》2013年第2期
07	《父亲的桥》	王秀梅	《人民文学》2013年第9期
08	《两份手抄乐谱》	沈 宁	《上海文学》2013年第7期
09	《小流放》	鲁 敏	《人民文学》2013年第5期
10	《透明》	蒋一谈	《人民文学》2013年第4期

中篇小说

名次	作品	作者	发表刊物或出版社
01	《长河》	马金莲	《民族文学》2013年第9期
02	《红星粮店》	刘鹏艳	《阳光》2013年第5期
03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方 方	《十月》2013年第2期
04	《暗杀刘青山张子善》	李 唯	《北京文学》2013年第4期
05	《朗霞的西街》	蒋 韵	《北京文学》2013年第8期

06	《莲露》	陈 谦	《长江文艺》2013年第5期
07	《月煞》	孙 频	《上海文学》2013年第2期
08	《我们的秘密》	刘永涛	《西南军事文学》2013年第2期
09	《手语者》	蒋 峰	《人民文学》2013年第1期
10	《獠》	陈 河	《人民文学》2013年第7期

长篇小说

名 次	作 品	作 者	发表刊物或出版社
01	《黄雀记》	苏 童	《收获》2013年第3期
02	《认罪书》	乔 叶	《人民文学》2013年第5期
03	《带灯》	贾平凹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
04	《天体悬浮》	田 耳	《收获》2013年第4—5期
05	《日夜书》	韩少功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

序

现实批判、历史沉思与精神开掘

——2013年小说写作趋势分析

王春林

莫言在2012年的荣获诺奖，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做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假若把莫言的获奖，与同样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高行健在2000年的获奖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前后不过十二年的时间，能够有两位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作家相继获奖，意义绝对不容小觑。如果把诺奖看作是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的一个迄今影响最大的文学奖，那么，莫言与高行健的相继获奖，自然也就标志着现代汉语写作很大程度上已经获得了西方文学的认可。更进一步说，莫言与高行健的获奖，一方面固然是他们自身卓越写作才能充分显现的结果，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无法否认他们的写作与总体中国当代文学之间一种不容剥离的紧密联系。也正因此，在一篇谈论莫言的文章中，我才会做出这样一种判断：“一方面，我们当然要肯定莫言小说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莫言的获奖，与他背后所实际存在的一个汉语写作高原之间，存在着某种无法剥离的重要关系。就我自己一种长期的阅读理解，我觉得，最起码如下这些中国作家的实际写作水准，也都已经达到或者说接近了诺奖所要求达到的那样一种思想艺术高度。请让我把这些作家的名字罗列在这里，他们是贾平凹、王蒙、史铁生、王安忆、陈忠实、阎连科、韩少功、张炜、北岛、铁凝、李锐、余华、于坚、格非、阿来等等。毫无疑问，无论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获奖，一点都不会显得很意外。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与莫言一起，以他们足够丰富的文学创作从根本上支撑起了我前面所说的那个现代汉语写作的高原。”

（王春林《莫言、诺奖与百年汉语写作的命运》，载《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之

所以强调所谓“现代汉语写作高原”的存在，就是试图确认“文革”结束后，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文化积淀与文学积累，中国当代文学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应该产生经典而且也已经产生了经典的时代。如何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已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这一方面，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其事的“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无疑可以被看做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种积极有效的努力。

迄今为止，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已经持续举办了十三届，在国内形形色色的各种年度排行榜中，不仅持续时间最长，而且也拥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威性。长期以来，小说排行榜的评委们秉承着“历史深度、人性内涵、艺术创新”的价值立场和艺术尺度，坚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分别从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文体角度对于中国的小说写作进行年度的梳理与把握。摆在诸位面前的这册沉甸甸的大书，就是排行榜评委们对于2013年的中国小说写作全面衡量梳理之后的结果。假若沿用所谓“大年”“小年”的说法来评价看待2013年的小说写作，那么，一个确定无疑的判断即是，与上一个自然年度的同类文体相比较，2013年绝对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收获颇丰的“大年”。这一年度，值得关注的小说作品主要有贾平凹的《带灯》、韩少功的《日夜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苏童的《黄雀记》、阎连科的《炸裂志》、吕新的《掩面》、田耳的《天体悬浮》、姚鄂梅的《西门坡》、陈河的《在暗夜中欢笑》、王蒙的《这边风景》、乔叶的《认罪书》、余华的《第七天》、张浩文的《绝秦书》、路内的《天使坠落在哪里》、张石山的《攻城》、柳营的《我之深处》、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弋舟的《而黑夜已至》、马金莲的《长河》、蒋韵的《朗霞的西街》、艾伟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毕飞宇的《大雨如注》、铁凝的《火锅子》等。更具体地说，以上这些作品分别以对现实的批判、历史的沉思以及精神的开掘而引人注目。

现实的批判

贾平凹以当下时代的维稳问题为关注对象的《带灯》，有着堪称尖锐的现实洞察力和突出的批判性。归根到底，超越问题小说的思路，把当下时代乡村社会人们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描摹呈现出来，方才算得上是贾平凹的根本写作意图所在。既然要书写维稳问题，就必然无法回避上访者这样一个群体。应该注意到，小说中的上访者之一王后生，曾经十分形象地把自己的生存处境比作被囚禁的囚犯。其实，又何止

是那些如同王后生、王随风这样的上访者呢？只要你再去关注一下那个本来因为在大矿区打工而患有严重的矽肺病，然而却硬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的毛林，看看那东岔沟村因为同样的有患上矽肺病的十三个农人以及他们那同样可怜至极的妻子，你难道能够说，他们就不是被囚禁的存在么？假若我们的思路再稍稍打开一些，你就会认识到，某种意义上，如同带灯、竹子这样每天忙于处理上访问题的镇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都可以被理解为被“囚禁”的存在。一句话，被“囚禁”的存在，正可被看作是贾平凹对于社会现实的一种有力洞穿。

对社会现实的犀利批判，同样是阎连科《炸裂志》的突出特点所在。阎连科的批判性，就在于，他以一种充满象征隐喻色彩的艺术方式，通过一个普通的村庄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如何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体量庞大的直辖市的故事，不无夸张荒诞地浓缩表现了“文革”后中国将近四十年发展演进历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阎连科鲜明地出示了自己的批判反思立场。这种批判色彩，首先就突出地表现在关于炸裂村发展第一桶金的描写上。孔明亮之所以能够顺利地由一位普通的村民成为炸裂村的村长，全赖他把自己一个人靠偷扒火车上所载各类物品的“致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炸裂村的村民们。而朱颖，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一报家族仇恨，干脆不惜组织村里的年轻女性以进城出卖肉体的方式积累自己的第一桶金。从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无论是“偷扒”，还是“出卖”（敏感的朋友可能已经联想到了，小说中关于炸裂村经济发展第一桶金的描写，说透了其实也就是“男盗女娼”这样一个成语的形象演绎），阎连科所描写展示的此种状况，强烈意味着中国近四十年发展演进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偷抢”、“欺骗”以及“自我出卖”的过程。在承认所谓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这个古老民族在此一过程中所付出的道德崩溃裂变与精神沦丧扭曲的惨重代价。只要能够达至经济发展的目标，手段、路径的正确与否，已然被完全抛诸到了脑后。面对如此一种不择手段巧夺豪取的掠夺性发展方式，阎连科给出的只能是严正坚决的批判立场。

尽管曾经引起过极大的争议，但无论如何，余华《第七天》那样一种强烈“冒犯”社会现实的特质却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第七天》的确写到了当下时代许多不幸的社会事件，比如强拆、火灾、弃婴、车祸、卖肾、暴力讯问，等等。这些都是近年来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能够关注表现这些问题，说明余华关注底层民生的情怀依旧，这一点当然值得充分肯定。不仅如此，余华在小说中意欲达到的批判性主题含蕴也值得肯定。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说：‘死无葬身之地’”。把小说的亡灵叙事与那些凄惨的人生故事以及这句带有谶言意味的结语结合在一起，作

家对于当下现实带有强烈否定性的批判性主题含蕴，自然也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小说中所描写着的这些普通民众来说，不仅不能够好好活着，而且死了以后居然也“死无葬身之地”！如此一种艺术笔触，所凸显出的，正是余华一种“冒犯”现实的写作勇气。

作为一部旨在思考表现一代知青命运的长篇小说，韩少功《日夜书》的引人注目处突出地体现为对“后知青”时代知青不幸遭际的真切艺术呈现。韩少功整部小说的叙事不仅不断地游走于过去与当下之间，而且，与其说作家的关注重心在过去的知青岁月，反倒不如说更在当下的所谓“后知青”岁月。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部长篇的一大艺术特质，正在于他把表现重心置放到了“后知青”岁月之中，通过当年那些知青们在“后知青”时代命运遭际的展示，最终完成了对于一代知青所面临精神困境的呈现与诘问。从这样一种小说的基本叙事语法进一步延伸开去，所谓“日夜书”者，是否可以把“日”理解为过去，把“夜”理解为当下？或者正好相反呢？又或者，“日”也罢，“夜”也罢，将其连缀在一起，也无非不过是生活的别一种代名词而已，其实并无深意存焉。

陈河的《在暗夜中欢笑》既是一部爱情小说，更是一部社会小说。作为社会小说，陈河此作的根本特点，就体现为对于海外华人艰难生存处境的真实描摹与再现。尽管说李布、二麦头、彭三城等人的现实遭遇都足称艰难，但最具代表性的，恐怕却是女主人公柳银犁。身为一位天生娇弱的女性，却和自己在国外打黑工的丈夫孙赛跑一起，被迫做起了“包送”的人头生意：“谁能想到，在她出国之后，还会在人生的暗道上越走越暗，最后走上了黑道。整天围绕在偷渡、绑架、越境等事情之中。”正因为有以如此一种见不得光的暗无天日的方式在阿国努力挣扎着讨生活，所以柳银犁在与李布真心相爱之后，方才强烈地盼望着能够借助于李布的力量摆脱自己的生存困境，同时也实现一种自我精神的救赎。没想到，李布却被一种家庭责任感牢牢束缚，柳银犁的希望最终无奈落空。正因为李布这里看不到任何希望，所以，实在无路可走的柳银犁才最终投入了彭三城的怀抱，先是替彭三城到远离地拉那的斯库台去做北方木材公司的中方经理，后来干脆就跟着彭三城跑到了更加遥远的非洲。从根本上说，她的一切违心行为，都是为艰难的生存困境所迫万般无奈的结果。

田耳的《天体悬浮》把自己的艺术聚焦点对准了可谓是变动不居的当下时代。与一些作家总是会设定一种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不同，田耳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尽可能充分地尊重现实生活的原生性与复杂性。尽管说田耳的小说中其实也潜藏有强烈的批判声音，但此种批判立场却是如盐一般地完全融入了水中。质而言之，现实生

活乃可以被视为是一片混沌的大海，作家一个重要的艺术使命，首先就是把这种混沌性尽可能地呈现出来，然后在做出理性的价值判断。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当下时代的诸多小说作品中，我们总是能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作家凌驾于生活之上的那样一种居高临下姿态的存在。很少能够有作家真正地放低身段，真正地潜入到生活的内里与深层，把那样一种仿佛正在一呼一吸着的真实生活状貌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田耳《天体悬浮》的一大令人惊异处，就在于它已经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天体悬浮》思想艺术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恐怕就是发现并成功地塑造了符启明这样一位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复杂人物形象。作为一位派出所的协警，符启明的精明强干，突出地表现在他那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上。符启明甫一出场，就以其对于刘所长的准确判断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因为刘所长在讲话过程中无意间说了一句“破案就像拔牙一样，都是无师自通”，符启明就判断出刘所长用来曾经有过当医生的经历。他的这种精明强干，在随后李二全与夏新漪案的侦破过程中也都有着突出的表现。夏新漪被害案侦破不久，符启明就离开了派出所，一面组织天文爱好者成立了所谓的“杞人俱乐部”，另一面则充分发挥自己的商业天才，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包括广告业、融资放贷、娱乐招嫖等一系列项目在内的经济活动之中，创造出了颇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符启明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合理延展，并最终由一个曾经的执法者变成了犯罪嫌疑人。别的且不说，单只就能够充分合理地写出符启明性格的发展过程这一点而论，作家田耳的艺术能力就应该得到大力肯定。需要注意的是，如同符启明这样的犯罪，绝对是高智商型的犯罪。叙述者“我”为什么要怀疑符启明呢？“除了对他的智慧略有了解，我还能列出如下理由”：一，“他痛恨安志勇远甚于我。他当年就知道是安志勇破坏了他和小末的感情，而他心里一直只装着小末一个女人。这是作案的情感动机。”二、“他掌控俱城城南的招嫖业务，手下有老詹这种忠实奴仆，摸清了安志勇有招嫖的习惯。”三、“同时，他掌控了俱城地区的凶宅买卖，所有凶宅必经他手。如果马桑死在安宅，这宅子就成了凶宅。”而安宅，却又是俱城最佳的观星位置。“照此推测，这一段时间他一直漂游在外，也就有了新的解释：所有预谋犯罪，罪犯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制造不在场证据。”就这样，一方面源于内心中积聚太久的仇恨，另一方面也为了获得最佳观星位置，当然也还有最自己的高智商的过分自信，曾经的侦破高手符启明，最终蜕变成成为借刀杀人的犯罪嫌疑人。至此，符启明的人性深度得到充分揭示，这一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得以塑造成功。

说到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批判，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无论如何都不能

被忽视。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篇幅不小的中篇小说，绝对应该被看做2013年中国小说写作的一大收获。它对于中国文坛的重要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2013年。从艺术表现技巧上说，方方并没有做怎样煞费苦心的努力，她只不过是以一种朴实异常的笔调，依循涂自强的人生轨迹，把他那悲剧的一生展示在了读者面前而已。没有丝毫的夸饰，也没有丝毫的艺术炫技，就连小说的语言，也都是那样一种平常不过的日常口语。但越是如此，我们便越是能够感觉到其中某种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存在。人都说，无技巧是最大的技巧，都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方方这部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再一次鞭辟有力地证明着这个艺术道理的存在。细致想来，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够具备一种如此直击人心的力量，原因不外有二。其一，方方在写作过程中貌似不动声色地倾注于小说文本中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虽然无一字煽情，但一路读来给读者形成的感觉却是字字血声声泪，作家把一种内蕴的情感力量巧妙地注入到了小说之中。其二，则是一种命运感的突出表达。衡量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大中型文学作品优劣与否的一种重要标准，就是要充分地考量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是否成功有效地传达出了某种浑厚深沉的命运感。

涂自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赵同学曾经对他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实际的情形确也如此，涂自强不仅天资聪颖，而且也一直都在不懈地努力，但这所有的努力最后却都变成了无奈的泡影。细细观察涂自强的人生，除了那个悄然失踪的学长老板之外，其他人不仅算不上坏人，反而总还会在涂自强处于困境时施予援手。既然寻找不到具体的造恶者，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极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中去寻找原因了。非常明显，涂自强的个人悲剧，与当下时代的固层化现实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倘若说在1980年代，涂自强们尚且能够凭借个人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到了当下这个阶层固化的门阀时代，涂自强们再怎么努力也都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个意义上，涂自强自然也就只能“徒然”自强了。“徒然”自强者，无济于事也。阶层固化这样一种现实，事实上业已完全堵死了涂自强们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改写自身命运的通道。更进一步说，阶层固化这样一种糟糕现实的形成，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体制所必然导致的一种结果。惟其如此，在阅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才会不时地联想到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虽然各自走过的道路不尽相同，具体的呈现形式有别，但从本质上说，我自己，甚至于我周围的很多人，却又何尝不是别一种意义上的涂自强呢？！行文至此，就不能不让我们想起方方此作中借助于采药之手写出的那首小诗：“不同的路 / 是给不同的脚走的 / 不同的脚 / 走的是不同的人生 / 从此

我们就是 / 各自路上的行者 / 不必责怪命运 / 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非常明显，小说标题的出处就在于此。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涂自强的悲伤，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个人的悲伤，而只能够被看作是一种时代普遍的精神悲伤。方方能够以犀利的批判笔触，洞穿时代沉重的盔甲，把这样一种极其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呈示在广大读者面前，绝对应该赢得我们充分的敬意。面对着涂自强这样一种沉痛的悲剧命运，我们就不能不仿用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著名诗篇“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追问一句：“谁在当下中国能过上好日子？！”

历史的沉思

现实的批判之外，2013年长篇小说写作的另一个基本维度，就是对于历史的勘探与沉思。作为苏童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部长篇小说，《黄雀记》的思想艺术价值主要体现为，通过一种象征寓言和精神分析的方式对于诸如现实、历史、罪恶、人性等进行了不乏深入的思考与表现，对于当下时代人们普遍的一种精神困境进行了极富艺术性的形象呈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恐怕就是由爷爷这一形象折射出的那样一种对于历史的深切洞察。作家关于保润爷爷的设定，所指向的，就是已经消失了的既往历史岁月。《黄雀记》的开头是从保润爷爷的拍照片写起的。“一个人无法张罗自己的葬礼，身后之事，必须从生前做起。这是祖父的信条。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祖父都要去鸿雁照相馆拍照，拍了好多年”。拍照片，就是要以影像的方式留住生命的记忆。保润爷爷与历史之间的隐秘联系，就此得以建立。但某一年，祖父却在拍照片过程中突然发现自己的“魂”给不见了。丢了魂之后的祖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想方设法找回自己的魂。因为在祖父的记忆中，他把自己的魂放在了一个手电筒中埋在了香椿树大街的某一棵树底下，所以他便开始了自己四处搜寻挖找灵魂的过程。

也正是在保润祖父四处搜寻挖找的过程中，小说渐次敞开了历史曾经的存在状况。只要留心一下保润爷爷和邻居们的对话内容，即可发现其中潜藏着过于丰富的历史内涵。诸如“汉奸”、“军阀”、“祖坟”、“土地”等语词的出现，在读者面前渐渐拉开的，就是历史的帷幕。因此，祖父在香椿树大街的刨挖寻找行为，就可以被理解为是作家苏童对于历史的一种深入追问探究。丢了魂之后的保润爷爷四处刨挖的行为，自然严重地干扰破坏了香椿树人家的日常生活秩序，因此而被普遍视为一种精神失常的状况。因此，与历史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保润爷爷的被送入井亭医院，就是

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这一过程所凸显出的，正是苏童对于既往历史一种真切深入的艺术反思。

青年作家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也属于历史反思这一层面极具代表性的一部长篇小说。尽管一部中国当代历史长达六十多年，依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其间曾经发生过诸如土改、农业合作化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派、“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一九八九”、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李浩在具体的书写过程中却不可能不作出自己的取舍，不可能照单全收地平均使用自己的艺术力量。正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虽然对于其中的一些事件也都可能会有所涉及，但就总体情形而言，李浩的书写重点其实还是放在了“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与“文革”这两大历史事件之上。通过对于叙述者“我”的家族成员尤其是父亲在当代中国的苦难命运的描写与展示，李浩把这段历史所具有的那样一种荒诞、吊诡、邪恶、盲目的反人性本质淋漓尽致地凸显在了广大读者面前。很显然，我们在这里所一力强调的中国当代历史所具有的“那样一种荒诞、吊诡、邪恶、盲目的反人性本质”，正可以被看作是李浩基本的历史观所在。面对如此一种尖锐激烈的历史观，我们便不难感受到其中隐含着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批判性反思。

乔叶的《认罪书》，也同样以对历史的沉思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虽然就总体情形来说，很难简单地把乔叶的《认罪书》归结为关于一部“文革”的长篇小说，但作家对于“文革”所进行的反思性描写，却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小说思想艺术上最成功的一个部分。这一方面，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艺术场景，就是有钟潮现场参与的红卫兵造反派头头王爱国对于梅好进行的那场惨无人道的残酷折磨。王爱国所设想出的凌辱“绝招”就是，在当众剥掉梅好的衣服之后，用毛笔在她美丽的胴体上写字。“身体”、“毛笔”、“书写”，把这样的细节与“文革”那段特别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其中一种象征隐喻意味的存在，就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一方面是堂而皇之的革命行动，一方面是不可告人的卑劣人性，二者就这样被乔叶巧妙地编织到了一起。在有力揭示历史残酷的同时，王爱国的变态人性也得到了可谓是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

对于中国现代革命进行批判性的艺术反思，是吕新长篇小说《掩面》的根本特质所在。借助于这些革命者的叙述话语，作家意欲实现的是对于革命本身的艺术勘探与追问。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明的，这些叙述者均属于立场特别坚定的革命者，他们的叙事话语充满着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洋溢出的是一种革命的自豪感。这一点，在第四章“呆若木鸡”中的那位女性匿名叙述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明明已经被

打入了政治另册被迫离职下放，但这位革命者的革命热情却依然高涨。但关键在于，一方面是人在控制话语，但另一方面却也会出现话语失控的情形。在这些革命者的叙事话语中，往往会在无意间留下很多自相矛盾自我解构的话语缝隙。吕新的值得肯定处，就在于他极敏锐地洞察并抓住了这些叙事话语中出现的缝隙，利用这些缝隙不动声色地实现了对于革命的一种解构式理性沉思。更何况，这些自相矛盾的话语缝隙，与革命者的革命立场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悖反效应。两相对照，吕新小说自然也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艺术反讽意味。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能够借助于革命者的叙事话语而巧妙地达至一种解构革命的理性沉思效应，正可以被看作是吕新《掩面》艺术原创性的一个重要层面。

以陕西现代历史上一场真实的大灾难为故事原型的张浩文的《绝秦书》，也是一部不容忽视的优秀长篇小说。需要强调的是，灾难叙事固然是张浩文《绝秦书》不容忽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就我个人的一种阅读感觉来说，与一般意义上的灾难叙事相比较，张浩文最具个性化的一种艺术处理方式，却是并没有就灾难写灾难，没有完全局限在灾难内部。张浩文的这种处理方式，或许正可以被视为作家对于惯常灾难叙事模式的一种艺术突破。就此而言，灾难叙事其实也只是整部《绝秦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借助于灾难叙事而不仅仅局限于灾难叙事，在更为阔大的叙事时空内探究追问中国乡村社会的存在境况，思考表现中国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恐怕才应该被看作是这部《绝秦书》更深刻的思想意旨所在。说实在话，虽然小说开头处的“序言”已有明确暗示，但我自己在阅读小说上半部的过程中，却几乎都没有产生过这是一部灾难叙事小说的感觉。很显然，这种阅读错觉的形成，所说明的正是张浩文艺术努力的一种成功。

小说的最突出成就，就是塑造了周克文这样一位怀抱坚定文化理想的文化英雄形象。这一形象，很显然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那样一种面对逆境时的力挽狂澜，那样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意志，遂使得白嘉轩与周克文成为具有内在同质性的文化英雄形象。周克文的文化英雄气质，最集中地表现在大饥馑之际拼全力赈济灾民的行为当中。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大饥馑，周克文的值得肯定的义举分别是先后两次找县长和开仓济民。周克文的出手赈灾，本意是要借此而张扬所谓的本土文化道统，没想到的是，他念念不忘的文化道统，在那些早已饥饿到忘乎所以程度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的饥民眼里根本就一文不值。准乎此，一种悲剧性结局的形成就是必然的事情。就这样，周克文最终成为一个极具悲壮色彩的文化英雄形象。通过文化英雄周克文的如此一种悲剧性结局，张浩文所思考表现的，既是中国文化难以

逃脱的一种艰难困境，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困境。

由以上分析可知，2013年的长篇小说，的确在现实的批判与历史的沉思这两个方面取得了相当骄人的写作成绩。不能忽略的，是现实和历史之间的转换问题。这就意味着，当下的现实也会变成既往的历史，而既往的历史却也曾经是当下的现实。一句话，怎样在深入体察人性的前提下，运用恰切的艺术表现方式把自己对于现实和历史的独到认识和体会表达出来，方才应该是中国作家在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写作上未来的根本努力方向。

精神的开掘

2013年的中国小说写作，除了现实与历史这样两个基本维度之外，也还有着精神的深度开掘这第三个维度。或许是因为文体所限，这一特质更多地体现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如果从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谱系的角度来说，马金莲的《长河》显然可以被归入到包括沈从文、萧红、汪曾祺在内的那个如王德威所言的“抒情传统”之中去。这篇小说的引人注目，根本在于其对于生命存在那样一种足称冷静超然的谛视与表现。小说所采用的是一种散点透视的表达方式，通篇没有整一的故事情节，把整个小说文本统摄成为一个有机艺术整体的，可以说就是死亡这个主题要素。小说故事发生在贫瘠异常生存艰难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作家以乡村世界所特有的春夏秋冬的自然季节转换为叙事背景，分别讲述了四个死亡的故事。第一个死亡者是年仅29岁的伊哈，他是为了给自己的父母解决吃水的问题而在自家院内打井，没想到绳子突然中断，伊哈就此以一种非正常方式撒手人寰。第二个死亡者，年龄更加幼小的素福叶，素福叶跟着后嫁给光棍麻雀的母亲田寡妇走进了“我们”村庄，很快就和“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但因为身患先天性心脏病，没过十二岁就病发而死。第三个死亡者，是叙述者“我”多年病卧在床的母亲。第四个死亡者，是年龄已经九十一岁的老阿訇穆萨爷爷。作为一个阿訇，穆萨爷爷一生最令人敬重的一个壮举，就是在五八年社教时，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把曾经对自己有恩的柯家老阿訇的埋体入土为安。关键处更在于，作家在小说中那样一种面对死亡时那样一种洁净与崇高的态度。“我们来到世上，最后不管以何种方式离开世界，其意义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死亡。”“村庄里的人，以一种宁静大美的心态迎接着死亡。”“死亡是洁净的，崇高的。”当然，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的一点是，马金莲之所以会对死亡做如此一种特别的理解和表达，与她的回民穆斯林身份，肯定有着格外紧密的内在联系。